

思以通其学 气以达其文

——曾枣庄教授访谈录

刘秀琼

曾枣庄,1937年生,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主编有《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宋文纪事》(合作)、《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与人合作笺注《嘉祐集》校点《栞城集》。近年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先后出版了《论西昆体》、《集部要籍概说》、《苏轼研究史》(合作)、《宋文通论》等。与吴洪泽合注有《苏辛词选》、合编有《宋代辞赋全编》。发表论文近二百篇,编成四部论文集,已出《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即出《文化、文学与文体》。近期将出版《宋代文学编年史》(与吴洪泽合著)、《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目前正在撰写《儒学辨伪》、《中国文体学》、《中国文体辞典》,编纂《中国古代文体资料汇编》、《宋文粹》。本刊特委托刘秀琼副研究员就相关问题采访曾枣庄先生,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理想与现实

刘秀琼 曾先生,您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但您却以研究宋代文学、研究“三苏”、整理宋代文献知名于学界。也就是说,您所学的专业与您所从事的研究有很大距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曾枣庄 说来话长。准确地说,我所学的历史专业不是一般的历史专业,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是学马列主义的,又叫马列主义基础系。1960年我从人大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哲学。由于我当时在报刊上发表

的一些文章,较受川大重视,工作不到三年就破格为我提了一级工资,被定为川大十个重点培养教师之一,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好景不长,大约在1962年,我读到内部流传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作的笔记。我读书习惯做笔记,摘要点,记读后感,我的这本《笔记》的笔记,在1964年川大“四清”中,被一个“朋友”揭发,结果批判了我大半年。好在我出身贫农,最后从轻发落,被逐出川大,调到四川省供销合作学校教语文,但在这个学校我没有教过一天语文。我刚被“四清”运动清出川大,不到一个月,却被调去参加省委“四清”工作团,到西昌去“清”别人,

不到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负责一个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的副组长。我在西昌搞了八个月的“四清”,毫无成绩可言,没有清出一个“走资派”,也没有清出一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倒给“地主、富农分子”各一人摘了帽子。

刘秀琼 这是怎么一回事?

曾枣庄 在批斗这两个“地、富分子”前,我找他们谈话,那位“地主分子”偶然提及他解放前在外教书,直至1962年才被“压缩”回家。我问他如何证明,他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份盖有公章的通知书。我知道他只能算“地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地主分子”。那位“富农分子”是个女的,谈话时发现她解放时才十二岁,远未满十八岁,也只能算“富农家庭出身”。我如实向“四清”工作团作了汇报,工作团同意我的意见,在大队开会时明确宣布:他们不是地主、富农“分子”,只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偏僻的边远地区,不但普通百姓弄不清这些概念,基层干部同样也弄不清。

刘秀琼 西昌“四清”结束后,您在干什么?

曾枣庄 我是1965年6月从西昌回成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我一回到供销合作学校,整个校园都贴满了“打倒”我的大字报,显然是早已准备好的。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省委点名批斗的三个重点对象之一。但我参加西昌“四清”知道一个政策,已处理过的人,有新问题的,新账、老账一起算;没有新问题的,就不能再处理了。因此批了我几个月后,他们对我这只“死老虎”也没什么兴趣了,而忙于批斗“走资派”,忙于打派仗去了,让我“等待运动后期处理”。这一等就是十年。我别无爱好,只爱读书、写作,于是就回到我老伴教书的母校简阳中学去偷偷读书、写作。

刘秀琼 读什么、写什么呢?您因写作而受批判,还敢写吗?

曾枣庄 不敢,所以说是偷偷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因为读书爱做笔记、爱写文章几乎成了“反革命”,但即使在“文革”中,在“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时,仍继续作读书笔记,继续写文章,当然,没有打算发表,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我被逐出大学讲坛后,反而得到了解脱,可以凭兴趣读书了。正是在“文革”期间,我写了《理想与现实》和《真理与谬

误》,汲取过去的教训,不敢再给人看,反而敢于写最真实的看法,即使今天看来,也未必合时宜。

刘秀琼 《理想与现实》是什么内容?主要观点是什么?

曾枣庄 手稿至今还在。上大学后的第一年,我曾恋恋于文学,一度要求转到新闻系(当时人大还没有中文系),未成功。一天偶然读到朱生豪翻译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对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了兴趣,于是花了一年的课余时间读完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译本。青年人的爱好是容易改变的,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讲起的,我很快对各式各样的乌托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西方莫尔的《乌托邦》到梅叶的《遗书》,从中国《礼记·礼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凡是我找得到的乌托邦著作,都找来读,并作了详尽笔记。我深深感到要实现人类的理想实在太难,莫说儒家的大同理想始终是空想,就是墨家的衣能蔽体、食能果腹标准极低的理想,人类至今也未完全实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理性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出是对启蒙学者所作的美好约言的残酷讽刺,它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失望。”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实往往是对理想的“残酷讽刺”。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主旨。

刘秀琼 《真理与谬误》又是写的什么呢?

曾枣庄 这是读了《老子》和《庄子》后,有感于历次政治运动而发,觉得世间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山那边是真理,山这边就成了谬误,反之亦然;今天的真理,明天就成了谬误;今天的谬误,明天又成了真理。

二、从研究杜甫到研究“三苏”

刘秀琼 这实际是思想史研究,后来怎么又研究起古典文学来了?

曾枣庄 这首先要感谢郭沫若。中学时,我对郭沫若十分崇拜,读完了他的自传、小说和剧本,但后来就逐渐对他有些不以为然了,觉得四川的文人大都很有骨气,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宋代的“三苏”,惟独汉代扬雄的《剧秦美新》歌颂篡汉自立的王莽例外。郭沫若在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时,写

的《百花齐放》诗,完全是应时之作,是对诗的糟蹋。“文革”开始后,几乎未出版过古典文学研究著作,1972年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也是应时之作,一反他在成都杜甫草堂所题楹联对杜甫的高度评价:“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该书对杜甫作了很多无端的指责,扬李抑杜的鲜明倾向,使我为杜甫大抱不平。于是我开始系统研读杜诗,也是边读边作笔记,最后整理成一部《杜甫传》初稿,但当时谁会出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杜甫传》呢?因此我只修改出了《杜甫在四川》部分,一是因为写杜甫在四川必须补叙其入川前和出川后的情况,等于仍是《杜甫传》,只是有所侧重而已;二是杜甫的现存诗作有三分之二作于四川,研究杜甫在四川的生活与创作是研究杜甫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想以地方特色取胜,争取得出版。我把稿子寄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并附了一封酸溜溜的信,希望他们把稿子看完再决定是否出版。感谢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文学编室主任杨莆先生,他硬着头皮读完全稿(他是写新诗的),并约我面谈,在问明我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经过,同总编李致先生商量后,向我宣布:决定出版。我的第一部专著《杜甫在四川》就这样于1980年出版了,这是我系统研究古典文学的开始。

刘秀琼 上世纪80年代初,您以一部《苏轼评传》引起学界关注;其后您又通过对苏洵、苏辙的开拓性研究,为“三苏”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您对“三苏”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与您是四川人有关吧?

曾枣庄 没有太大关系,倒是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有直接关系。我自来喜欢苏轼的为人,但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评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朝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

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甚至被投进监狱。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要太锋芒毕露,也不难位至宰辅。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不安于朝,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的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我认为,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都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做了不少贡献。苏轼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阙表》)。因此,我们不能说苏轼是什么顽固派、保守派、投机派或动摇的中间派,而应该承认他属于革新派,强调改革吏治,强调渐变,反对骤变。他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形势,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他的根本政治主张,可以说一生从未“动摇”过。这就是我1980年前后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苏轼〈与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等系列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苏轼评传》的基本观点。

刘秀琼 您不仅写了《苏轼评传》,还写了《苏洵评传》、《苏辙评传》,这又是为什么?

曾枣庄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但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侁等人的言论中,发现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又开始研

究苏洵,撰写了《苏洵〈辨奸论〉真伪考》等文,出版了《苏洵评传》。《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但世间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物。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兄弟在性格、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和诗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很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我又撰写了《苏辙兄弟异同论》等文和《苏辙评传》。《苏辙评传》也可叫《苏辙兄弟异同论》,着重强调苏轼兄弟的不同。

三、古典文学研究与古籍整理并重

刘秀琼 您固然以“三苏”研究、宋代文学研究闻名于学界,但影响更大的似乎还是您主编的三百六十册、字数逾亿的《全宋文》和五大巨册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这属于古籍整理范畴。您是怎样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到古籍整理的呢?

曾枣庄 误会,我从来没有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到古籍整理,而是以古籍整理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我研究苏轼没有整理苏轼的诗、文、词集,那是因为整理本已经很多,特别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那一套。我研究苏洵,就与人共同笺注了《嘉祐集》,研究苏辙,也与人共同校点了《栞城集》。

刘秀琼 王水照先生在为您编著的《苏轼研究史》所作序言中称您的研究“论述性、资料性兼具,用多种著作形式去逼近同一研究对象”,也使您的“研究富于整体感与系统性”。台湾的龚鹏程先生在为您和吴洪泽先生合著的《宋代文学编年史》所作的序言中说:“考述并重,文史合一……兼此二事”,所著《三苏评传》,均搭配以诗文选集及汇评,两相辉映,足见一斑。而文史合一则更难。古籍整理本属于史部的工夫,能得文章趣味者甚少。曾先生的文献整理,却始终关注于文学问题,希望能以其考案所得,贡献于文学史研究,斯所以为难能。本编(指《宋代文学编年史》),我以为就是在《全宋文》的基础上,更集中发挥先生之长的表现。”这都是指您“以古籍整理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这一特点吧?

曾枣庄 两位先生都过誉了,但“论述性、资料性兼具”,作“文献整理,却始终关注于文学问题”,是大体符合我的实际的。

刘秀琼 您能谈谈主编《全宋文》和《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具体情况吗?

曾枣庄 好的。我一向认为文科科研是天生的个体劳动,我主持编纂这两个大项目,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出于不得已。1984年我被调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负责人,古籍所的经费主要由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提供,除每年少量的日常经费(一年只有两万元)外,主要是按科研项目提供经费,因此我们不得不上一个大项目。1985年秋我们申报了《全宋文》,第一次就争取到了50万,后来又追加了35万。现在看这不是个大数目,但在二十多年前是十分可观的,川大古籍所的基本建设,图书资料、微机设备等都是靠这笔钱购置的。为此,我只好暂时放弃了原有的研究计划,把全部精力用于编纂《全宋文》。经过我和刘琳先生以及全所同志的努力,1993年基本完成了《全宋文》的校点任务,1995年基本完成了审稿工作。

刘秀琼 为什么《全宋文》到2006年才出齐呢?

曾枣庄 编书难,出书更难。编书再难,我们自己还能控制;出书难,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全宋文》于1988年就开始出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后每年出几册,1995年出至第50册就停止出版了。巴蜀书社为出《全宋文》,赔了不少钱(每出一册要赔一万多元),实际上已无力继续出下去。直至2002年7月我们与巴蜀书社才正式解除合同,改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360册《全宋文》终于一次推出了。《全宋文》从立项到出齐,其间艰辛,一言难尽。《全宋文》出齐,作为主编,我本应高兴,但却高兴不起来。我在《全宋文出版感言》中说了如下辛酸的话:“主编《全宋文》,耗费了我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而且是年近半百到年近七旬的二十年,是人生最关键的二十年。理科,二三十岁是出成果的最佳时间;文科,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才是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1998年我查出癌症,但我病后八年的个人研究成果,超过此前成果的总和,就是明证。我对主编《全宋文》毫不后悔,因为它确实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如果有来生,问我还会不会再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

刘秀琼 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

学分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曾枣庄 也是。大型类书《中华大典》的编纂，从酝酿阶段开始，我就参与其事，参加了几次征询意见的论证会，并被邀担任《中华大典》的编委，参加了《中华大典》的工委、编委会议。当时我的思想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五四”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终结，现在确有必要对“五四”以前的文化加以总结，作为发展现阶段新文化的借鉴，并以之昭示子孙，传播世界。但另一方面，也深感兹事体大，需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现在未必能完成。正因为当时我有比较浓厚的畏难情绪，故最初并不愿意参加这一工作。1993年程千帆先生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来信，聘我为《中华大典·文学典》副主编和《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程老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在我编《全宋文》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作了很多指点，对我们帮助很大。程老要我参加，我是不敢推辞的。

刘秀琼 您有了主编《全宋文》的经验，还怕编只有一千多万字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吗？

曾枣庄 你有所不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古籍整理项目。我深深懂得编纂大型类书《中华大典》，比主编大型断代总集《全宋文》的难度要大得多。《全宋文》所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分散了，而《大典》资料的分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编全文总集，整个别集、总集的文章部分可以全收，《全宋文》所收大家文，有一册甚至数册都取材于一部书的，而《大典》连整篇文章全收的都极少，绝大多数都是节录，一部书往往仅节录一则或数则，是否当收及收文起讫都颇费斟酌。小家，我们为资料缺乏而苦恼。真正没有资料也好办，我没有，你也不会有。最令人担心的是自己认为没有别的资料了，读者却从一些常见的书中为你指出一条或数条不应漏收的资料。中国古籍太多，即使是常见书，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完全读完、完全记着的。大家，我们又为资料太多而苦恼。大家不缺资料，取舍却更费神。校对的难度也比《全宋文》大得多，因为《全宋文》往往收整个集子中的文章，找到一种书就够我们校几天了，而校《大典》的每条资料几乎都要找一种书，找出来往往只校几百字甚至几十字，仅找书就花了比《全宋文》

多若干倍的时间。而全部资料至少要校三次以上，工作之繁重，也一言难尽。

刘秀琼 我从一些报道上看到，学术界对此书评价很高，如戴逸老先生曾说：“这本书的确好，非常有用，超过了自己的预料。《文学典》这第一炮应该说是打响了。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广博，材料丰富，大大超过了《古今图书集成》；其次书的框架比过去的书科学合理，查找容易多了；第三个特点是资料的出处标得比过去的清楚，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曾枣庄 多肯定，少批评，是同类座谈会的共同特点，不可太认真。我作为《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对此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清楚的。关于框架结构，我曾给文学典主编程老写信，主张应像一般史书的史传那样，传记在前，评论在后。1993年11月，程老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黄希坚先生共同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表明《文学典》还可以有与现在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编法。关于资料出处，类书一般只作为研究工作的资料线索，真正作研究都必须复查原书，因此资料出处就特别显得重要。《中华大典》统一规定，引用诗文只用两级标目，即作者加篇名。我们主张四级标目，即作者、书名、卷次、篇名。理由是：有些别集篇幅很大，数十卷，甚至一两百卷，只有作者和篇名，复查很费事；有些作者没有文集，其诗文是从总集、诗话、笔记、类书中收集来的，只有作者和篇名，根本无法复查；即使有文集传世者，其诗文也有辑佚得来的，只标作者和篇名，也无法复查。这都是此书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四、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

刘秀琼 您刚才说，您从来没有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到古籍整理，那么您在编《全宋文》、《中华大典》时，还进行过哪些研究工作呢？

曾枣庄 为及时完成《全宋文》、《中华大典》，我的研究工作曾为古籍整理让过路，但从没有停止过。相反，在古籍整理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并收集相关资料。因编纂大型总集和类书的需要，我的研究范围反而扩大了。比如编纂了几种工具书。一是《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这是中

华书局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中的宋代卷是由我和李文泽、吴洪泽主编的,约一百一十万字。本书按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收录作家,凡诗、词、文、诗话、词话、文话(如《四六话》)、小说、文学性笔记的作者都属于收录范围。鉴于宋代有作品存世者很多,已不可能像宋以前各卷那样,凡有作品者皆收,而是有所取舍,全书共收宋代作家二千五百余人。二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宋辽金文学》部分,第一版的主编是吴世昌先生,副主编是周振甫、胡念贻先生,均已过世。这次修订(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约我作主编,字数要求控制在四十万字以内。我一向认为改别人的稿子比自己写还难,既要尽量照顾别人的表述,又要改得符合自己的意思,加上字数不多,故我就决定自己改写这些辞条,删了一些辞条,也补了一些辞条。此书现已出版。三是《集部要籍概说》,这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为高校文科编写的参考教材,也带有工具书性质。裘锡圭先生是这套教材的主编,他邀我承担此书的编写任务。因为是教材,只能概述学界公认的观点,但通过对历代总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的简介,也提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刘秀琼 去年3月27日,您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上发表了《文化盛世的启示——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长达两版的文章,您的研究似乎在向文化领域扩展?

曾枣庄 是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大文化背景,因此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文化史与科举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宋代诸帝之嗜好与宋代文化之繁荣》、《宋朝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典籍中的日本国》、《论嘉祐二年贡举兼与张兴武先生商榷》、《论儒学辨伪》等文,并即将出版《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一书。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关捩点,不仅本身绚烂多姿,而且贯穿了整个发展过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贡举的两个月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关捩点,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包括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的各种代表人物齐集京城,闪闪发光,崭露峥嵘,堪称文星璀璨。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都是仁宗朝的文化精英,知贡举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他官位

卑微,当时只是馆阁校勘,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嘉祐二年贡举中的作用(首向欧阳修推荐苏轼的试卷),几与欧阳修相近,权同知贡举王珪、梅挚、韩绛、范镇也是北宋文学名家。如果说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基本上集中了仁宗朝的文学代表人物,那么嘉祐二年的进士则基本上集中了神宗、哲宗两朝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一提起嘉祐二年贡举,人们就想到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其实,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也于此科及第,曾布位至宰相,地位比苏轼兄弟还更显赫。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及洛党干将朱光庭,变法派人物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等亦于此科及第。欧阳修为了纠正诗文革新中的不良倾向,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对“太学体”给以致命打击,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黜。这改变了整个宋代文坛的风气,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并对邻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欧阳修权知嘉祐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刘秀琼 您已停止了早年的“三苏”研究吗?

曾枣庄 没有,这方面根据随时发现的问题,也写有不少文章,就不一一细说了。作家研究上,我已不再限于“三苏”。在校点、审订《全宋文》的过程中,我对一些有兴趣的作家,作过一些研究,如夏竦、二宋(宋庠、宋祁)、丁谓、欧阳修、邵雍、范镇、黄庭坚、陈师道、苏过、晁公遡等等,我都写过专论。但往往浅尝辄止,刚开个头,又被迫放下,研究得更多的是李之仪。我在审订《全宋文》李之仪文时,对其诗文词都产生了兴趣,本想写本《李之仪研究》,但仅撰写了《李之仪年谱》、《姑溪居士杂考》、《姑溪居士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成就》、《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等文章,至今尚未完成全书。

刘秀琼 去年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逾百万字的专著《宋文通论》,这应当是您主编《全宋文》后,从文学、文体学角度对宋文的一次总结吧?

曾枣庄 可以这样说,此书对宋文诸体作了全面论述,包括宋代辞赋(含骚体辞、仿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四六(含诏令、公牋、表、启、上梁文、连

珠等)、韵文(箴、铭、赞、公、哀祭文之类)、散文(含书信、赠序、书序和篇序、题跋、传、行状、碑、墓志等)。1985年我开始主持编纂《全宋文》,在一次征询意见的座谈会上,有些老先生提出要我们在抓《全宋文》的同时,抓《全宋文》的副产物,认为其价值未必亚于《全宋文》本身。我们接受了这一意见,拟了三十多个《全宋文》副产物的题目,并规定谁编纂就谁署名,只要求通报研究所一声,以防重复和撞车。我自己至少有三部书稿实际是《全宋文》的副产物,除早已出版的《宋文纪事》外,就是刚出的《宋文通论》,还有尚未完成的《宋文粹》。我写文章比较粗疏,但较快,写二十七万字的《论西昆体》只花了七个月,写《苏轼研究史》的中国部分,四十万字,也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写《宋文通论》花了二十年,除因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花了六年时间,《全宋文》的反复审稿也花了我不少时间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方法不对,我要求自己研究某种宋文文体,就要遍读该体宋文,这当然费时间。大约1989年前,我同已经过世的北京大学倪其心教授谈起此书撰写很慢时,他说这样写你永远写不出来。他说对了一半,写还是写出来了,但却费时太多。

刘秀琼 我们都很期待您的《宋代文学编年史》,什么时候能面世呢?

曾枣庄 顺利的话,今年年底即可出版。这部书篇幅很长,近三百万字,是我与吴洪泽先生合作完成的。

刘秀琼 编年体文学史现在已出了不少,您这部书有什么特点呢?

曾枣庄 中国最早的史书为编年史,以时间为序,按年月日编写,如《竹书纪年》(已佚,仅有辑本传世)、《春秋》、《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的又一写法为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始于《史记》,以后各朝为前代修史都用纪传体,成为“正史”。《史记》、《汉书》设有《儒林传》,《后汉书》还在《儒林传》外设有《文苑传》,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大体仿此,加上其他一些单独列传的著名作家,实为中国断代纪传体文学史。《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中的《文学名家列传》则视为通代纪传体文学史。这些文学

家传的内容基本上由作家生平、文学名篇及评论(论赞)组成,作家生平一般都较简明,评论更为精要,而列举文学名篇则不惜篇幅,往往整篇引用。有些作者没有文集传世,其文学名篇往往赖此得以保存。到了现当代,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才出现了以章节标题的文学史。但时间过去一百余年,大家对这样的文学史也不太满意,说它们是作家、作品汇编。但离开了作家、作品,还有什么文学史呢?南宋产生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这就是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为补《资治通鉴》史事分散之不足而作。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编年体以时为经,纪传体以人为经,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三者皆不可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编写文学史,能否把中国史书的这三种写法结合起来呢?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文学结社(流派),有的跨时较长,涉及的人物较多,按以时为纲的编年体或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来撰写,都将支离破碎,只有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才能把这些内容叙述得眉目清楚。如江西诗派是宋代十分重要的诗歌流派,统治南北宋诗坛将近百年,涉及的诗人数以百计。无论按时还是按人都将很分散。而按纪事本末体则可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宋代文学编年史》主要借鉴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写法,同时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史赞的长处,较之已出的编年体文学史,在体例方面作了这种尝试,是否可行,还有待读者评判。

五、从研究文体到儒学辨伪

刘秀琼 您目前在作什么研究?听说您在写《中国文体学》,完成了吗?

曾枣庄 我在同时写《中国文体学》、《中国文体辞典》,编纂《中国文体资料汇编》,完成了一大半,但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刘秀琼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文体学的?

曾枣庄 我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是从二十多年前编纂《全宋文》时开始的。为解决《全宋文》的文体分类及其编序,我托人选了二十种宋人总集和别集,把它们的文体分类及其编序制成一张大表,又参考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意见,撰成了《〈全宋文〉文体分类及其编序》一文,以便大家校点编纂《全宋文》时共同遵守。后来我在《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上发表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研究范围》实际上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后来因忙于编《全宋文》,未再继续这一工作。

刘秀琼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写这三部有关中国文体学的书的?

曾枣庄 我真正想撰写《中国文体学》,是因为读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发表的饶晓明先生的《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后开始的。此文的《摘要》和开头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近日笔者重读东坡词,惊奇地发现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了的事实:苏东坡究竟创作了多少首词?有哪一个专家学者,哪一部研究专著说清楚了?”《摘要》和文章结尾处回答了这一“令人‘惊奇’”的问题,原来就是“笔者”自己:“通过精细的考察,准确的辨析,笔者认定《竹枝歌》、《襄阳古乐府》、《黄泥坂词》等40首被打入另册的东坡词大都为长短句,属‘自度曲’,是东坡‘为歌而作’、体现东坡个性的词。”

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在我看来,苏词整理工作的重点已不在辑佚,而在辨伪,能辑出两三首苏词已属不易,更何况一次就辑出“40首”呢?南宋初曾慥辑的《东坡先生长短句》,收苏词凡72调328首;南宋初傅干的《注坡词》12卷,收苏词凡67调272首。这就是宋代苏词的存世情况。经过历代的辑佚,唐珪璋《全宋词》共收苏词360首,这新增的30多首苏词并不完全可靠。曹树铭的《东坡词》认为确为苏词者只有319首,其余的都列入互见词和误入词。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更严,认为确为苏词的只有288首(与傅干《注坡词》相近),列入互见词8首、存疑词11首、误入词53首。饶文一下子辑得“40首”,苏词就不是300多首,而是400首了。但读完饶文,却发现作者“新近”并未“发现”一首“东

坡词”,只不过是把东坡的“长短句”诗说成是“东坡词”而已。饶文最重视“长短句是词的最基本的特征”,“为长短句,属自度曲,应入词集。若定词牌,可定为《……》,词题可定为《……》”,饶文用了数十次,几乎成了他“新近发现东坡词”的惟一标准。是的,“长短句是词的最基本的标志”,多数词都是“长短句”,但长短句并非都是词,逆定理不一定都能成立,因此这证明不了“被打入另册的40首……长短句”都是东坡词。是否是词不能仅用“长短句”来证明,因为词是隋、唐时代的产物,兴盛于宋,但中国诗歌从产生之日起,就有长短句诗,即所谓的杂言诗。不仅《诗经》有杂言,古歌谣、楚辞、乐府、歌行也有杂言,而且更多。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杂言诗》云:“古今诗自四、五、六、七、杂言之外,复有五、七言相间者,有三、五、七言各两句者,有一、三、五、七、九言各两句者,有一字至七字、九字、十字者。”朱彝尊《词综序》云:“自有诗而长短句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朱彝尊仅讲长短句诗是“词之源”,而不是“唐诗宋词”的词。即使如此,也引起了文体学家褚斌杰先生的非议,其《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说:“这种意见,把长短句式看成是词的惟一特点,不顾词的时代条件和其他特点,把词的来源一直远溯到上古,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不正确的。”我觉得移褚斌杰先生对朱序的意见来评论饶文,也许更为恰当。

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科都不重视文体知识的教学,大概是有感于此吧,1981年郭绍虞先生就写了一篇《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的文章(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我觉得现在是响应郭老号召的时候了。

刘秀琼 为什么您不写则已,一写就同时编写三种呢?

曾枣庄 三种各有分工。《中国文体学》偏重于理论分析,只能谈主要文体,不可能讲所有文体;《中国文体辞典》将讲所有中国古代文体,只是备查,力求简明,不能展开分析;之所以还要编《中国文体资料汇编》,这是我一贯的作法,把研究与资料

收集整理相结合,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防信口开河。

刘秀琼 您刚才说三种书已完成了一大半,为什么又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呢?

曾枣庄 因为我一向凭兴趣作研究,现在有了更多兴趣的课题,只好把它们暂时放一放。

刘秀琼 什么“更有兴趣”的课题?

曾枣庄 儒学研究。在上世纪,孔子两次被痛批。一是“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二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提出要“痛打”落水狗。自上世纪80年代起,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孔子,研究孔子,为他开各种研讨会,举行祭祀大典。一千年前,就编出了《大藏经》(佛藏)、《道藏》,却无人编《儒藏》;明清有少数人想编,迄未编成,现在却有三个大学编《儒藏》。这是好事,是有意义的。

刘秀琼 您对孔子、儒学有何看法?

曾枣庄 历史上的孔子与中国历代多数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区别。据《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记载,孔子是孤儿,家庭贫寒,只能以粥糊口。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贫寒反使孔子“多能”。后来他做过鲁国的“委吏”(主管仓库之吏)、“乘田”(管理畜牧之吏),“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古代鲁国很小,在鲁国“摄相事”比今天大一点的地级市市长大不了多少。

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直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未废除死刑,而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连“杀无道以就有道”也是反对的,可见其思想之先进。但后来他为鲁司寇七日,就杀了少正卯,并暴尸三天,自己就没有遵守自己的主张。后因政见不为所用,孔子“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在卫时,孔子不惜放下身段,屈己以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想走夫人路线,借南子以说灵公。弟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如果我不是为行道而见南子,老天爷都会厌弃我。但孔子东奔西走,周游列国,也不为各国所用。郑人骂他为“累累(不得志貌)若丧家之狗”。门人子贡如实告诉他,孔子欣然而叹曰:“然哉,然哉(是啊是啊)!”我

举这些史实,毫无贬低孔子之意,只在说明他生前同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很不得志。

刘秀琼 那后代为什么那样推崇他呢?孔子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应该怎样重新评价孔子?

曾枣庄 那自然也是因为他有高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地方。他“历聘诸国”未被重用后,只好返鲁。他一生特别是在晚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兴办教育,收徒讲学,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二是从事典籍整理,他搜集了此前的文献资料,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三是提出了一整套儒家伦理体系,这是历代统治者和儒学大师们最为推崇的,尽管他们大都从未打算付诸实践,甚至与孔子提倡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孔子生前就是一位有影响、有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而长沮、桀溺、接舆等则讥讽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死后,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外,恐怕就是上世纪对他的两次“打倒”最不公平。因此,我对现在重新评价孔子是完全赞成的。但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吹过了头,就难免令人生疑,令人担心。

刘秀琼 今天吹过头了吗?您能举些例子吗?

曾枣庄 举不胜举。现在有人说,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核心、灵魂,是引导中国走向辉煌的指南针,是中国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什么时候改成为以孔儒为指导了?有人说,没有儒学就没有“灿烂的中国文化”。孔子出生前并为孔子所特别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代的文化不是“灿烂的中国文化”?《诗》、《书》、《易》、《礼》、《乐》、《春秋》难道是孔子所著,不是他对此前“灿烂的中国文化”的整理?孔子出生后的二千五百年,难道只有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儒家以外的释道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各地的地域文化,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受儒家文化影响,难道它们就没有各自的特色,这些特色就不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是孔子和儒学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衍,没有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就会重过“从人到猿”的生活。这实际是宋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翻版,好像孔子以前,中

国人白天都只有打着火把才能走路 ;“天已生仲尼”后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难道就是一片光明世界吗 ?把孔子打扮成中国的救世主 ,以儒学取代整个中国文化 ,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

刘秀琼 孔子出生前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独尊儒术”是在汉武帝以后。

曾枣庄 那只是表面现象 ,汉武帝以后 ,孔子也从未取得独尊地位。现在有人说 ,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就不会有灿烂的中国文化。汉武帝“罢黜百家”是在弘扬中国文化 ,还是在摧残中国文化 ?汉武帝真的“独尊”过“儒术”吗 ?中国哪个朝代的皇帝真正“独尊”过“儒术” ?就以“独尊儒术”的开山祖师汉武帝来说吧。他虽然表面上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但实际上他重用的是杜周、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 ,内行集权 ,外攘四夷 ,紧步秦始皇的后尘 ,而对儒学大师董仲舒却只给了一个江都相的小官 ,后来因言灾异还把他下狱 ,差点被杀掉。这就充分说明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假 ,而外儒内法才是真。在汉武帝招揽儒者 ,声称他“欲施仁义”的时候 ,他的一位心直口快的大臣汲黯曾当面戳穿了他的假面具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弄得汉武帝怒不可遏 ,“变色而罢朝”(《史记·汲黯列传》)。

汉武帝的后代对此心领神会 ,同样是外儒内法 ,也没有“独尊儒术”。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 ,大臣杨晖、盖宽饶都因讥刺朝政被诛。他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劝他说 :“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汉宣帝大怒道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 ,好是古非今 ,使人眩于名实 ,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 !”(《汉书·元帝纪》)“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就是汉家的制度 ,也是中国历朝皇帝的制度。汉宣帝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历史的真象 ,把“独尊儒术”的画皮完全撕掉了。

就汉武帝个人而言 ,他真正信奉的不是儒教儒术 ,而是巫教巫术。杨亿的《汉武》诗对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其诗好用典 ,大意是说 ,汉武帝曾遣方士入海寻仙山蓬莱 ,在西王母所居之地 ,建甘泉通天台求不死之药 ,铸承露盘以承甘露 ,和玉屑饮之 ,可以成仙 ,可以长生不死 ,派李广利前后率兵十余万

伐大宛 ,索取汗血马 ,汉武帝所宠爱的李夫人卒 ,方士少翁自称能以方术招致李夫人 ,武帝可于帷中望见 ,被武帝封为文成将军 ,文成乃伪造帛书以喂牛 ,杀牛得书。事败露 ,杀文成 ,为掩盖其真象 ,却说他是食马肝而死。诗的最后两句“待诏先生齿编贝 ,那教索米向长安”是写东方朔 ,武帝初即位 ,东方朔上书 ,自称“目若悬珠 ,齿若编贝” ,“可以为天子大臣”。武帝壮其言 ,令待诏公车。东方朔俸禄很薄 ,又上言“臣言可用 ,幸异其礼 ;不可用 ,罢之 ,无令但索长安米。”方回《瀛奎律髓》卷四概括此诗主旨说 :“讥武帝求仙 ,徒费心力 ,用兵不胜其骄 ,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

巫蛊之祸更是汉武帝信奉巫教巫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谗臣江充与太子有矛盾 ,诬告太子埋木人以诅武帝。太子矫诏杀江充 ,长安大乱 ,言太子反。武帝发兵围太子 ,父子战于京师 ,死者数万人 ,太子逃亡 ,自缢而死。武帝后来知其无辜 ,为筑思子台。前人有不少咏思子台的诗赋 ,白居易《思子台有感二首》有“但以恩情生隙罅 ,何人不解作江充” ;“但使武皇心似烛 ,江充不敢作江充”句 ,意谓巫蛊之祸的责任主要不在江充 ,而在武帝自己。苏过奉父苏轼之命所作的《思子台赋》 ,痛斥汉武帝“多忌”、“好杀” ,把左右的人都当作敌人 ,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巫蛊之祸。当他征伐四夷时 ,似乎是“雄杰”之主 ;当他信奉巫教 ,失道嗜杀时 ,似乎比婴儿还更无知 ,更愚蠢。苏过还进一步揭露说 ,汉武帝害死了太子 ,就“慷慨悲歌 ,泣涕踌躇” ,而他杀了那样多的大臣、忠臣 ,“皆以无罪而夷灭 ,一言以就诛 ,曾无兴哀于既往 ,一洗其无辜”。苏过之所以在《思子台赋》中大动感情 ,显然寓有父亲忠而被谤、远谪海南的隐痛。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 ,儒术几乎被历代皇帝奉为国策。但也像汉武帝一样 ,从来没有一朝皇帝独尊过儒术 ,而是并尊诸术 ,只要对巩固统治有利。宋真宗撰《崇释论》 ,称“释氏戒律之书 ,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这一主张实际得到了三教多数人的拥护。僧人契嵩既通佛典 ,又悉儒经 ,其《镡津文集》多论佛道与王道合。东京上清宫道士说 :“非道教无以升君子 ,非释教无以化下愚 ,非儒教无以理国家。”由此可见 ,三教合一的思

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刘秀琼 您是从什么角度研究儒学的？

曾枣庄 现在《儒学研究史》已出了好几部，恐怕我已经没有研究余地了。但他们研究的都是真儒学（虽然未必皆真），我是想专门研究历史上的伪儒学，写本《儒学辨伪》。《红楼梦》第一回的回目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这是《红楼梦》中最早出现的两个人物。据《红楼梦》作者自己解释，“甄士隐”者，“将真事隐去”；“贾雨村”者，乃“假语村言”。全书就是借假语村言讲述隐去的真实历史。《红楼梦》第一回写太虚幻境时有一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此联可作各种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把“假”的说成“真”的，人们怕受骗上当，就会把“真”的也认为是“假”的，把“无”说成“有”，“无中生有”，人们怕受骗上当，就会把真实的存在（“有”）也会当作不存在（“无”）。上下联的前半句，以“假作真”，以“无为有”，揭露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假货充斥的现象；后半句“真亦假”、“有还无”，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真亦假”，没有人相信“真”了；“有还无”，没有人再相信“有”了。因此，为了维护“真”，就必须识破“假”；为了维护“真孔学”、“真儒学”，就必须识破“假孔学”、“假儒学”、“假道学”。

《论语·雍也》云：“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君子为儒将以明道），无为小人儒（小人为儒则矜其名）。’”孔子真不愧是圣人，他生前就料到既有“君子儒”，就必有“小人儒”。自儒学产生之日起，其内部就产生了分化，既有被尊为醇儒、宿儒、耆儒、名儒、通儒、大儒、巨儒、硕儒、鸿儒、君子儒者，也有被斥为竖儒、庸儒、迂儒、腐儒、鄙儒、愚儒、俗儒、谀儒、陋儒、小人儒者，而我更愿以真、假二字区别各代儒者。君子儒是真儒学，小人儒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指他们真正相信并大体实行儒家的伦理道德；假儒学、假道学，则是借儒学之名炫耀自己，贩卖私货。苏轼《荀卿论》评孔子云：“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那些“匹夫匹妇之所共知”的孔子言论，圣人都未必能完全实行，而有些“圣人”、大儒则根本未曾打算付诸实践。

我对儒学自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从来也没有研

究过儒学，但四川大学编《儒藏》把我封为两个学术委员会主任之一，成了“假作真”。即使客气点，不说我是“假儒学”，但至少也是“非儒学”吧。既有此虚名，多少应为它作点事情。现在研究真儒学的人很多，我就来研究真儒学的对立面假儒学吧。因为识破“假孔学”、“假儒学”、“假道学”，也是维护“真孔学”、“真儒学”的任务之一。

六、不平则鸣，不懂就学

刘秀琼 我对曾先生的研究工作情况大体了解了。很多名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家学渊源和师学渊源，您好像完全没有谈起这方面的问题。

曾枣庄 实际上都谈过了。前面谈到我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最后都从轻发落，就因为我出身贫农。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有什么家学渊源呢？我大学毕业，不能说是自学出身，但我所学的专业与我现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有什么师学渊源呢？没有这方面的长处，不好瞎编！

刘秀琼 曾先生早已是著作等身了，您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

曾枣庄 我的研究工作可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不平则鸣，不懂就学。如前所述，我研究杜甫、苏轼，以及现在研究伪儒学，都是不平则鸣、不合时宜的。苏轼有一次酒醉饭饱之后，摸着他的大肚子问同席歌女说：“你们说我这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是满腹才华，有人说是满腹文章，只有侍妾朝云说“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刘秀琼 所谓“不懂就学”好理解，因为您后来的研究都不是您原来所学的，都是后来自学所得。

曾枣庄 是的。我原来只读过杜甫、苏轼的选本，决心反驳一些人的不实之词后，就决心尽读杜甫、苏轼的作品，读得很仔细，边读边作笔记，后经整理，就成了最早出的两部书《杜甫在四川》、《苏轼评传》。我还喜欢寻根究底，于是又尽读苏洵、苏辙集，写了《苏洵评传》、《苏辙评传》。编总集、类书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也是边干边学。我带研究生也特别强调要他们自学。我带过的日本庆应大学博士生池泽滋子女士，有次她对我说，想参加一些《全宋文》的工作。我说：《全宋文》已经处于扫尾阶段，得

不到全面训练了,但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仅听我讲课没用,要自己动手作研究,提高才显著。鉴于她在中国的学习期限仅一年,她是为研究苏轼来我这里的,苏轼集还没有读完,就得离开中国,几经斟酌,在取得她的导师庆应大学刚晴夫教授的同意后,我建议她研究丁谓,因为丁谓被王禹偁誉为“诗类杜甫,文类韩柳”,其现存少量诗文也确实不愧此评;丁谓原有作品二百多卷,现存诗文经《全宋诗》、《全宋文》广泛搜集,仅编了三卷;反复研究,一年时间也够了。丁谓位至宰相,有关他的资料也很多,而丁谓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是不公正的。有争议就好作文章。池泽很努力,在中国一年多,用中文发表了《丁谓年谱》、《苏轼与琴》多篇论文。经过回国后半年的修改补充,用中文撰写并出版了《丁谓研究》一书。我对她确定选题、草拟题纲起了一定作用,但她在中国一年取得如此成绩,也主要在于她的努力自学。

刘秀琼 爱读书的人很多,但取得您这样多成果的人似乎不多。

曾枣庄 不能这样说,这里有个读书方法问题。

一要专一。我读书是比较杂的,但在一段时间里,往往只读一个方面的书,只写一个方面的文章,决不东一锄头西一棒。有人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写,报刊杂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这是不可能深入,不可能有独到之见的。人生精力有限,真正能在一两个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就很不错了。这里有一个博与专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读书宜博(即使随便翻翻也好,可以引起你对某些问题的注意);研究宜专,真正对一两个领域作了深入研究,知识面自然就扩大了。我跟着苏轼转了几圈,就大大扩充了知识面。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就会注意收集所要研究问题的有关资料。否则,一些极有价值的资料,会在眼皮底下跑掉。以后想起,可能就再也查不到了。

二要全面占有资料。我这几十年主要是在作资

料员,《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以及正在编的《中国文体学资料汇编》等,都是资料工作。至今仍有人看不起资料工作,但不是建立在全面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所谓“新论”,即使能造成轰动效应,也不可能持久。

三要弄清基本史实。进行作家研究,我主张从作年谱开始。如果该作家没有年谱或虽有年谱而太简略的话,应对该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先进行编年。我觉得只有如此,研究工作才比较扎实,不致写起文章或论著来,张冠李戴,东拉西扯。故凡我有兴趣,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作家,我往往先为他作年谱,除《北宋文学家年谱》所收我撰写的五种年谱外,还有好几种年谱的未完稿如《田锡年谱》、《二宋(宋庠、宋祁)年谱》、《晁说之年谱》、《释惠洪年谱》,均因别的工作未能如愿完成。我指导学生进行作家研究,也很强调年谱的重要性。我曾建议吴洪泽专门研究历代年谱的体例及其演变,收集整理宋人年谱,撰成《宋人年谱集目》,他后来又编有《宋人年谱丛刊》。我指导池泽滋子女士研究丁谓,也要求她先作《丁谓年谱》。

四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我的中学班主任说我爱反起来想问题,我为此吃尽苦头,不是我出身好,后果不堪设想。但也为此尝到了一些甜头,我今天能取得一点成绩,与我爱反起来想问题是分不开的。如果只会人云亦云,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谁还会读你写的那些东西呢?

刘秀琼 苏轼《送人序》有“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之论,听了您的学术经历,深感治学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作者单位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